

云南现代史料丛刊

第八辑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一九八七年

4

云南现代史料丛刊

第八辑



云南省社会科学出版社发行

一九八七年

云南现代史料丛刊
第八辑

云南现代史料丛刊

第 八 辑

本期责任编辑：

孙代兴、朱佳丽

云南现代史料丛刊

第八辑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昆明市气象路45号）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局印刷厂印刷

一九八七年六月

〔内部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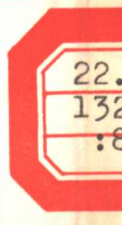
云南省期刊登记证云出字第079号

成本费：1.20元

云南现代史料丛刊

第八辑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所

目 录

一九三六年前后云南党的简况·····	李浩然 (1)
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回忆 ·····李同生口述 荆德新记录整理 (5)	
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在云南的活动情况 ·····钱昌照口述 蒋中礼记录整理 (32)	
滇桂黔边区罗盘区妇女运动简况·····	甘庭芳 (36)
蔡锷家乡调查资料及其它·····	谢本书 (48)
蒙自研究之一·····	龙永行 (58)
基诺族社会历史调查概述·····	王懿之 (112)
关于杜文秀起义问题研究资料辑录(下)·····	蒋中礼 (136)
隋唐时期中国文化对周围民族及邻国的影响 ——《剑桥中国隋唐史》(绪论)节译·····	赵鸿昌 (158)
近代云南的教育概述·····	夏光辅 (167)
云南护国史料补正——访护国老人李丕章·····	孙代兴 (181)
锡与个旧·····	杨霁洲 李表东 张若谷 (192)

一九三六年前后云南党的简况

李浩然

一九三五年六一七月间，党组织从浙江镇海调我到上海，领导我的“老余”告诉我，广西西部游击区派人来上海要干部，组织上决定要我去，并要我与广西来的同志同住，作好准备工作。

之后不久，我突然收到约有两年不通信的费炳从云南来信。来信说他已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昆明分校任区队长，他的革命志愿如初，希望我帮助他参加革命工作。费炳在一九三〇年七月——一九三二年七月与我同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八期学生。一次我俩同住一个病房，因而相识，政治上很谈得来，相处很好，以后我们常在一块谈论政治、学习，组织读书会。我们愤恨国民党不抗日，只有找共产党当红军才是出路。一九三二年七月，我要去上海设法找共产党当红军去。费十分赞同，并相约谁找到，要相互介绍。这次收读他的来信，虽知他已在军校毕业，并做了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同时又有二年不通信，但我从信上表示看来，我仍确信他是要革命的，我将此情况报告了组织，并建议在我去广西之前，最好去昆明一趟，在滇建立一个关系后再去广西，这对广西游

击活动是有好处的。组织上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我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月间乘船去滇了。

到滇后，了解到费炳与李剑秋、李立贤（陈方）二同志十分友好，革命意愿也相同，都要求能参加共产党。很快我同意他们入党并报告了上级，其中费炳曾一度参加过革命工作，我当时没仔细查考研究，对他也算是新入党的。开始我们在一块商量工作，但未成为一正式组织和具体分工。议论过建立支部、小组等，但未作最后议定。这时我报告了昆明情况，说明已发展几位党员，可以开展工作，我自己可以去广西了，请示我何时去广西，如何去法，后组织来信说，既然发展了组织，今后就在云南开展工作不去广西了。

以后党员多了点，特别是有的县有党员了，感到我们必要建立一个组织。经过多次酝酿商议，确定用云南工作委员会名称较好、较机动。并作如下分工，费炳主管军事，李剑秋管组织，李立贤管宣传，我负责对上联系等。有了分工但没有研究职务名称，如委员、书记、部长……职称。我将这一组织情况向上报告后，不知为什么，上级没有明确肯定或否定的回复，我当时认为不答复就是同意了。

我当时理论政治水平太低，党的基本知识太缺乏，对那时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认识上是极模糊的。对于我国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来，中日民族矛盾已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基本政治情况的变化，我是根本不理解的。党的八一宣言当时我没看到。本来组织上将八一宣言寄给我了，是用药水将宣言写在一套新的线装中医书每页的背面的。不知为什么，我用了事先约定的两种药水，其字迹均未显现出

来。我还是从上海一些较进步的报刊上看到八一宣言的内容。所以在当时我还是根据我离沪时上级要我搞武装斗争的指示，一心想搞武装斗争。宣传上，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反动政策。强调必须打到国民党。在工作方式方法上，基本上是手工业式，通过个别宣传交朋友组织读书会，利用灰色半灰色组织等，以发展党的组织。当时没作什么文字宣传，在党内出过一期通报式的油印品。一九三六年双十二后，才模糊感到要积极组织公开或半公开的抗日救国组织的必要，才开始通过党员积极酝酿活动组织救亡团体。到我离滇时，在基层是否已组成抗日救国组织，我不记得了。

关于楚雄暴动，我记忆有以下一些。一九三六年红二方面军长征过云南时。我曾去罗平一次，想与红军取得联系，但未联系上。之后，我们考虑到红军在群众中留下了很深的影响，我们要趁时积极开展工作，有可能时就发动武装斗争。但具体如何搞武装斗争，心中是没数的，考虑工作没基础，也没想到即时动手。之后，我将搞武装斗争的思想告诉过楚雄国民党区队长陈××，他是党员，工作是积极的。一九三七年春（？），他们自动夺了区队的枪，拉了二百多人上山。当时我们没有农村工作基础，政治上没强调武装群众抗日……，当国民党以一个旅追剿时，很快就被打散失败了。

我离沪太久，深感得不到上级及时具体指示，工作十分困难，于是我于一九三七年六月离滇赴沪请示了。

我在滇年余，工作上算播了点种，说不上开花结果。

到沪后已发生“七七事变”，上海区十分需要干部。组织上要我交代好云南工作就在上海不去云南了。

（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

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 抗日救亡运动的回忆

李同生口述 荆德新记录整理

我原名李家鼎，一九三七年在昆明入党。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遵照党的指示撤退到重庆，改名李桐荪。转到新四军工作时，为便于战士们书写，改用同生。

我出生于一九一五年，一九三一年我初中毕业就离开家庭。那时日寇入侵，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民族危机深重，在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人民不断掀起抗日救亡革命浪潮，在群众革命斗争的教育下，我才逐渐觉醒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来。

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初期的经历和见闻。

一九二五年至二八年间，国内发生五卅惨案、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和国民党的“清党”等重大事件，昆明也有一些表现，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卅惨案发生，爱国的青年音乐老师教唱《五卅运动歌》时，含着满腔愤怒的热泪给我们讲述了五卅惨案经过，

同学们都深受感动。不久北伐战争开始，昆明中小学生组织了提灯会游行，学唱了《打倒列强除军阀》、《五四纪念歌》和《工农兵联合起来》等歌曲，冲刷了过去学校中唱的《花好月圆》、《可怜的秋香》等粉饰现实的旧歌。

在大革命形势下，原来高小学的一门宣扬孔孟之道的《修身课本》，改为《社会课本》，内容突出的讲述自鸦片战争以来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事迹。特别记得的是，我上高小时的一位女老师赵琴仙，她在上社会课、地理课时，还让我们在课堂里上台表演社会课中几段爱国历史故事，并给我们讲解过什么是国民党、三民主义，共产党共产主义，以及国共两党合作打倒军阀等知识。一九二七年间，常因师范学校和其他学校学生“打架”停课，并听说云南国民党有三派，即法政派、圆通派和舅子派。法政派以法政学校、联合中学的人为多，是左派，后来也有改组派(汪精卫)的人混入，圆通派头子张邦翰、张禄，是蒋介石派来的，舅子派是龙云的等等，“打架”就是这些派别的斗争。后来圆通派被捣毁，法政派也沉寂了，龙云自成系统的国民党终于出现。

国民党搞“清党”，共产党受迫害，蒋介石派李宗黄回云南配合龙云搞“清党运动”。进步学生组织街头演讲，提出“打倒李宗黄”等口号，梁元斌在讲演时被国民党军人枪杀。一天说要举行追悼，赵琴仙老师领我们高小学生，每人手拿标语旗子，到伪省党部礼堂参加追悼会。因情势紧张。追悼会开得简单。会后把梁元斌烈士棺材从伪省党部礼堂抬出举行示威游行。我们小学生队伍走在前面，刚一出大门，就被国民党军官拿着左轮枪对着我们每个人，强迫把标语旗

放下。赵老师告诉说不放下。那些狗军官硬把旗子上的纸扯掉。我们紧紧拿着旗杆子，集合在一起，他们又把小学生队伍冲散赶走。小学生们被冲散，我们仍跟着中学生继续冲出举行游行，队伍绕道从三市街经正义路走到五华山伪省政府请愿。在五华山路口，伪军堵截，队伍一拥向前，恰好把附近一家浆洗店晒衣被的竹竿架挤倒了，竹竿噼哩啪喇掉下来，声响很大，吓得那些伪军官纷纷后退，以为是群众暴动，可见反动派是何等的虚弱。

北伐战争开始，看见国民党军队废弃了令人讨厌的旧军装，换上比较有精神的军装，看来似觉有点新鲜，但是经过这次被这些伪军官拿着枪威吓学生之后，使大家感到所谓的国民革命军比旧军阀更凶残更可恶。他们的行为，简直和《社会课本》上所讲的满清封建军队杀害老百姓完全是一样，这算什么“革命”呢？

人们还议论说，蒋介石龙云等军阀，虽然打的是国民党的招牌，实际上和旧军阀一样，换汤不换药。

共产党员赵琴仙，是国民党“清党”追捕的主要对象，四处搜查，状元楼外的疯人院也去搜过。有个圆通派的人沈华安，是教过赵琴仙的老师，借师生关系跑到赵家，骗得赵母的信任，将赵引出当场逮捕。省中学生共产党员甘汝松，是甘汝棠的胞弟，国民党“清党”后已隐蔽起来。甘汝棠由于卖身求荣投靠国民党，获得去南京受训的机会，上火车时叫他弟弟去送东西，火车出站后甘汝松即被捕。不几天，赵、甘二人被龙云杀害于昆明西郊地坛寺。当时国民党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还恬不知耻地诬蔑共产党人

是六亲不认。群众说，国民党人老师杀学生，哥哥杀弟弟，他们才是真正六亲不认的。

那时工人运动的情况不大了解，只听说共产党员吴澄，曾作过人力车夫工人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我考入成德中学，五月后才开学，老同学们还指着学校大门口的平台，说那里就是放过梁元斌烈士尸体的地方。反动政府为了了解学生的政治思想，考题中曾有“你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什么不同？哪个好？”的题目。

那时学校每星期一都要作纪念周，煞是介事地读总理遗嘱。人们背后讽刺说，蒋介石是信基督教的，所以学着做礼拜祷告。

聂耳是省师学生（原名聂守信），又是我们的近邻，我入中学后，他常和我们在一起，带我们唱些比较健康的歌曲，以抵制一时流行的靡靡之音。我们知道他在学校参加和推动过一个进步的文艺组织。大约一九二九年冬至三〇年初，他离开昆明一段时间，又回来上学了。后来他告诉我说，本来是去韶关，参加朱德同志借国民党旧军人范石生部队办的学生队，去到不久情况变化，只得又回昆明。以后他就去上海找工作了。

一九三一年我初中毕业，升学有困难，在昆明又找不到适当的职业，抱着离开闭塞的昆明到上海投靠亲友找事做的幻想到沪。这个幻想不久破灭，只得暂去就学。三二年松沪抗战后我转赴广州，拟续报考学校。入校后又见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媚日投降，对内压迫学生运动，制订严酷的会考制度，每届会考都有一些学生青年被折磨丧命。在全国掀起的

反会考运动下，提出过“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口号。

一九三四年我和几个进步同学结成核心小组，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和国内进步刊物，初步明确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我们向往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从而大力推动广州中山大学高中的学生运动，并以公开的群众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争取团结了不少各大中学的青年学生。

一九三六年夏，有中大学生共产党员钱兴来组织我和同乡陈纬等人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即抗日救亡前哨社，学习了我党中央的八一宣言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以此为前哨社的纲领。

一九三六年冬，为取得一个合法地位好做革命活动，我考入中山大学。按党的指示，抗日救亡前哨社与中大其他两个党的外围组织合并建立秘密的中山大学学生抗日救亡协会，领导推动中山大学青年抗日运动。我被推选为协会领导核心的组织委员，并与附中教员虞焕章共同负责附中的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因工作联系，才知道虞焕章（现名杨康华，广东中山医学院院长）那时是我党广州工作委员会学委的负责人。这年冬，我曾申请加入共产党。因广东党在大革命后曾遭破坏，当时广州工委刚在重建中，党分配给我一些具体工作，但入党手续未最后解决，党组织叫我推动中大进步学生到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还让我帮助誊写油印党刊《先锋队》。通过党刊，对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学习，在往后多年的斗争中，为我指明了方向。

中共昆明支部的建立和两个党组织的合并

一九三七年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我们利用广州基督教青年会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时，昆明基督教青年会姓王的干事（王齐勋，以前我的教师），曾约我回昆明帮助开展歌咏活动。这年暑假，我征得虞焕章的同意，决定乘暑假回昆一趟。虞告诉我说，已将我和陈纬介绍给在昆明工作的人联系。临行前两天七七事变爆发，由于旅行手续已办妥，只得快去快回。

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旬我到昆明时，先利用基督教青年会办起歌咏班，教唱抗战歌曲。一周后，唐登岷和民众教育馆的赵国徽，以救国会（秘密的）关系来约我去民众教育馆组织民众歌咏团。

八月底，我向赵国徽提出我要返回广州，因为我的工作和工作领导关系在那里。赵国徽说，歌咏活动刚开展，你离开会使活动受影响，留我不要走。并向我透露说，昆明也有党的组织，可以联系。同时介绍我和费炳认识。根据当时情况，我只得暂时留下。

一九三七年九月的一天，陈纬找我，说虞焕章把我们两人介绍给李群杰了，并约我去李家开会，研究建立党的组织问题。

李群杰原是广州中大法律系学生，我们同住过一起，但我没看见他参加过中大的群众斗争活动，对他的政治情况不了解。李回昆明后，先在昆师任教，并与昆明大绅士袁嘉谷的孙女结婚。李的叔丈人袁丕佑，当时任龙云省政府的秘书长，李通过这个关系在省府秘书处任秘书。为此，我和陈纬

商定，和李研究问题时，对我俩在广州时有关党的活动暂不暴露。

到李家参加这次会的有李群杰、唐登岷、曹世文、陈纬、允冰（尹斌）和我共六人。开始讨论了一下政治形势，认为龙云是地方实力派军阀，但和蒋介石有矛盾；抗战开始，昆明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各学校都有进步学生，可以开展广泛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象歌咏这个形式就容易发动群众，应当重视。同时还研究准备写一篇对外宣传抗日形势的文章。这次会议决定建立昆明支部，开展党的工作。决定由李群杰任支书，唐登岷、陈纬任宣传委员，允冰和我任组织委员，曹世文任支部秘书。

由于赵国徽曾向我透露过有党的组织，但情况不大清楚，又曾去问过赵国徽。赵说，他和赵炳等人原来是有党组织的活动，但在一年前已和上海党的领导失去了联系，正联络中。关于李群杰的情况，赵说知道李有党的关系，但看到他写过一本《太平天国运动思想史》，而书的序言是由叛徒叶青用笔名写的，现对李正在了解中。问到尹斌、唐登岷二人，赵说是与他们有联系。

鉴于有两个党组织的存在，又考虑到李群杰的政治态度不够清楚，我即找尹斌商量，认为同时有两个党组织，又有人两边都跨着，加之对李群杰的政治情况不太清楚，这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尹斌说，他正要为这事去武汉长江局汇报。于是我们商定，由尹斌出面先找两边负责人协商；在问题没有解决前，两个组织应暂不发展组织；两边的人在工作上并未发生分歧，应共同努力积极支持当前的群众斗争。由

尹斌去长江局汇报，听候上级指示。经尹斌找费、李研究，达成了如上协议。之后，尹斌即去长江局。尹斌走前曾和我约好密写通信联系办法。

一九三八年初，尹斌从武汉写来一信给我，说李群杰是有党的关系的，长江局很快派人来。

一九三八年六月左右，马子卿受长江局的派遣，用名于莘，到达昆明。到后给我一信，我去旅馆见他时，发现有伪政训队的人出入，即将马接到我家里。我向他详细汇报了有关情况。马说，李群杰是有党的关系的，并叫我找李来见面。

马子卿对我说，这次来主要是整顿党的组织，举行党员登记。他叫我印了党员登记表，也给我填了一份。不久他告诉我，已成立了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

后来马子卿陆续给我讲了如下情况。

马在离武汉长江局时，是李富春交待给他的任务，说李群杰是在华南入党，华南工委给过他来发展党组织的任务（那时华南工委在香港，负责人是方方和乔冠华）

李群杰到昆明后，首先发展了唐登岷、曹世文、匡沛兴、罗吉昌等同志入党（一九三七年冬，匡、罗二人已介绍经汉口去延安）。昆明支部建立后，李写过报告并附有党员名单给华南工委，华南工委将报告转送过长江局。马子卿在离长江局前看过这份报告和名单，来昆明时指定先找我联系。李群杰在这件事情上有错误，说有三十多个党员。后来核对没有那么多。另外虞焕章把我介绍给李群杰，他吸收我参加会议，并任支部组织委员，但没有及时办理完备的入党手续，